

全球史译丛

PEREGRINE HORDEN
NICHOLAS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墮落 之海

[英]佩里格林·霍登

[英]尼古拉斯·珀塞尔——著

吕厚量——译

[上册]

地中海史研究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中信出版集团

THE CORRUPTING SEA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全球史译丛

墮落之海 地中海史研究

[英]佩里格林·霍登

[上册]

[英]尼古拉斯·珀塞尔——著

吕厚量——译

PEREGRINE HORDEN

NICHOLAS PURCELL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更新知识地图 拓展认知边界

《全球史译丛》

主编

刘新成

编辑委员会

李伯重 李庆新

梁占军 刘北成

刘家峰 刘文明

刘新成 施 诚

王立新 夏继果

向 荣 岳秀坤

《全球史译丛》总序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

一般认为，1963年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一书是全球史诞生的标志。40多年来，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在美国，2000年全美已有59%的公立大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五年后又提高了十个百分点；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甚至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中学讲授全球史。在加拿大，全国26所研究型大学中已有14所开设了名为“全球史导论”的研究生课程；2005年有些大学把全球史列入了本科生教学计划；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两省，75%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了全球史课程。在德国，世界史教育已有上百年历史，但近来出现了有关如何讲授世界史问题的热烈讨论，不少教师和学者主张用“全球史观”改造乃至取代传统的世界史教育体系；2005年在德国召开的“欧洲全球史学大会”更把这一讨论推向高潮，年轻一代史学家多数是全球史的积极拥护者。在意大利，2001年全球史课程进入中学；在2002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上，虽然仍有许多史学家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只能是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不可能存在全球一体的历史，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进行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也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在哥伦比亚，虽然全球史尚未列入正式课程，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已被史学界广泛接受；许多历史学家主张，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与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欧洲

史、非洲史以及其他许多民族与地区的历史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应当将拉美各国、各个地区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观背景之下重新进行审视和描述。

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构成了全球史产生最重要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进而对以解释“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全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也有重要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方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基于以上背景，全球史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时，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经过 40 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

和进展。

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绝对客观”，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为描述历史的唯一可靠依据。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学刚一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国家本位”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社会空间”。

全球史接受了“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家”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是人

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相关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 600 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流说”，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和新见解。

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20 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强调客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力。布罗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反对结构主义的，认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话，是约束人类行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说”，而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引起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从非洲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奴隶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获得了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巨变并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史学者也提出，社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现毕竟始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由此全球史学者

得出结论：人类活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条件决定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把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由来已久，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对非西方世界给予更多关注。但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呢？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超越“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中心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查克拉巴迪（Dipish Chakrabarty）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迪那样悲观。作为西方学者，他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作为。在学术实践中，全球史学者为从学理上颠覆“欧洲中心论”的确做出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觉地抵制“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起”原因，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宏观综合分析指

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世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突破强调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也就淡化了欧洲国家的榜样作用。

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在21世纪初中左派政府当政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全面启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趋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出现“全球史信仰”之说。全球史略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球史时需要注意的。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忽略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很不够。其二，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

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仁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刘新成

2006年5月



一幅中世纪的堕落之海形象。饱受折磨的意大利祭司奥皮奇诺·德·卡尼斯特里斯（Opicino de Canistris, 1296—约 1350）绘制的这幅反向拟人化地图描绘了男性的欧洲（亚当）向女性的非洲（夏娃）俯身的造型。他们即将碰到一起的头部便是地中海的入口直布罗陀海峡，而底端的地中海东岸则是一个魔鬼的头颅，被命名为“原罪之由”（*causa peccati*）。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MS Pal. Lat. 1993 f. 2v, 经允许后复制。见 Salomon（1936）155—160。

柏拉图认为，想要拥有治理良好城邦的人应当像躲避教唆作恶者（*ponerodidaskalos*）那样远离大海。

——斯特拉波（Strabo），《地理学》（*Geography*），7.3.8

于是他底气十足地说道：“当阁下写书时，您可别写：‘这里有座美轮美奂的教堂和一座高大巍峨的城堡。’因为贵族老爷们自己也看得见这些东西。您应该写：‘这座村子里连一只母鸡都没有。’那样一来，读者们马上就知道那是一座什么样的村庄了。”

——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1907），《沙漠与播种》
（*The Desert and the Sown*），93

由于这部著作的包罗万象，我们当然需要感谢许多同事和朋友帮助提供思路与书目。如果有人要问我们为何不在这里——列举他们的名字，我们会说，那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暴露我们对其建议进行的、会令他们感到不快的再加工——这种改造的彻底程度往往会使得我们无法利用学者们常见的借口——“转述之外的错误才是我们自己的”。更为现实的、必须省略他们名字的理由在于，帮助过我们的人是如此众多，逐一列举实难搜罗殆尽，有所遴选又未免要厚此薄彼。我们是否可以仅在此笼统地向所有这些朋友表示我们最诚挚的谢意呢？通读过全书文稿的只有我们劳模式的计算机、文字校对胡麦拉·艾尔凡·艾麦德（Humaira Erfan Ahmed）、细致入微的文字编辑亨利·马斯（Henry Maas）和我们自己。我们两位作者对所有章节的文字负共同责任，即便其中某些部分的材料是由一人收集并撰写成文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为这些文字的离经叛道与未尽完美而共同分担指责。不过，整部文稿很早的一个版本曾因彼得·加恩西（Peter Garnsey）逐字逐句的审校而获益良多；本书第四、五两部分的初稿也得到过艾米莉·克恩斯（Emily Kearns）和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的精心审读。我们需要特别感谢上述几位的帮助，以及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对相关书目的无所不知和对这项研究百折不回的热情。我们对布罗代尔（Braudel）未发表手稿的了解来自于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ay)。艾伦·约翰斯顿 (Alan Johnston) 慷慨地指点我们对第 5 章所描述的、引人注目的公元前 475 年风俗予以关注。在文稿的后期整理过程中, 萨拉·科布登 (Sarah Cobden) 在核对统一注释与书目方面贡献良多; 罗伯特·霍伊兰 (Robert Hoyland) 帮忙核对了我们对阿拉伯语的拉丁化转写。大卫·考克斯 (David Cox) 是一位杰出的地图专家, 珍妮·鲍恩 (Jane Baun) 则是一位严谨的审校者。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All Souls) 和圣约翰学院 (St John's) 在这项研究的各个阶段曾给予过慷慨的资金支持。伊索贝尔·索恩利 (Isobel Thornley) 后期从伦敦大学申请到的经费也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极大便利。我们还应感激出版方的宽容, 衷心向菲利普·卡彭特 (Philip Carpenter)、特萨·哈维 (Tessa Harvey)、路易斯·斯宾塞利 (Louise Spencely)、杰森·佩尔斯 (Jason Pearce) 和布里安·约翰逊 (Brian Johnson) 的耐心与帮助表达谢意。

最后, 我们或许应当向年事已高的阿尔纳多·莫米利亚诺 (Arnaldo Momigliano) 表示感谢。在听取了关于这项研究的构想后, 他的反应仅仅是哈哈大笑。

本书共采用了四类注释方式。

(1) 数量最多的一类注释标注的是研究性论著文献。

我们会在正文章节中列出这些著作的作者和年代，在书目导读¹中列出其作者、年代和简短的标题。按照学术惯例，我们仅在最后精编的正式书目中给出完整的作品信息。

(2) 第二类引用主要针对的是原始文献。

引用过具体版本的所有作品都会在参考文献里按编订者姓名排序的条目中列出。

在所引段落可参阅任何校订本或译本的情况下，我们仅仅给出作者姓名和著作标题。除标题翻译可能导致所指原著难以辨识的情况外，我们均会将原始文献的题目译成英文。

原始资料汇编——特别是公开出版的多卷本古代铭文集——在正文与书目导读中均用缩写符号标识。

¹ 在本书英文原版中，除正式书目外，两位作者还利用较大篇幅撰写了一份十分详尽的“书目导读”（Bibliographical Essay）。对于难以获取或直接阅读书目导读所介绍的英、法、德、意、西班牙文学学术成果与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亚兰文原始文献的中文读者而言，这份导读提供的有效信息相对有限；而对于地中海史领域的专业研究者来说，这部主体部分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出版于2000年的作品所开列的专题书目也无法反映发展迅猛的地中海世界研究在近20年内取得的前沿成就。基于以上考虑，本书中译本略去了原书的书目导读部分。对这部分内容有兴趣或需要查对正文注释中涉及书目导读（BE）各章节与索引表中原书530页以后内容的读者请参阅本书英文原版相关内容（P. Horden and N.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0, pp. 530-641）。——译者注

(3) 本书使用的所有缩写符号(包括参考文献中提及的期刊与丛书缩写)均在缩略表中以独立条目列出。

(4) 本书内部各部分之间的交叉引用会列出章节号(或书目导读章节号),如 VII. 3 或 BE VII. 3。

我们对除亚兰文(Aramaic)和阿拉伯文外所有译文的准确性负责。